

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贡献海洋科教力量

□ 田 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十多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担当，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历史大势与时代发展潮流的高远格局与宏大视野，为加快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海洋科教力量。

担当强国建设与全球海洋治理使命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海洋大变局和全人类价值共识，向全世界发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提供了具有高度包容性、前瞻性、实效性的价值理念，成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鲜明旗帜。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有效实现全球海洋治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需要共同努力与一致行动。以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责任的高等教育因其独具时代敏感性、知识共享性、资源流动性和国际开放性，被赋予了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有所作为的价值理性和实践基础，特别是海洋高等教育本身就是推动全球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海洋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阐释了更大更广泛的海洋事业发展图景，在这一宏大的时代语境中，服务强国建设和全球海洋治理诉求一同进入海洋科教力量的行动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中强调要“为建设教育强国、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高等教育事业、海洋事业高度重视。海洋科教力量特别是涉海高校要在建设教育强国中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深耕蔚蓝海洋，扎根中国大地，放眼世界。我们要充分发挥海洋科教力量特别是涉海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天然结合点的优势，深化全球海洋教育治理价值共识与共同行动，以担当作为着力构建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海洋科教对外开放新局面。

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海洋人才

海洋人才是赢得海洋国力竞争、解决全球性海洋问题、深化海洋文明交流互鉴的战略资源。在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海洋科教力量最核心的价值是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与国际竞争力的优秀海洋人才。我们要始终坚守海洋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更要胸怀“国之大者”，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

在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中强调的“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殷切期望，统筹全球布局与国家所需，立足区位优势与办学特色，站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升级人才培养目标，构筑“谋海济国”与“全球视野”思想基石，将个人价值与国家责任、全球使命相融合。面对国内海洋事业改革和全球海洋治理变革进入多维协同整合的新时期，秉持全球化办学理念，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海洋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中外融通、文教融铸，全面推进教育教学的变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中强调要“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海洋科教力量要加强有组织人才培养，发挥自主培养海洋强国建设栋梁之才与具有国际胜任力高层次人才相协调的潜能优势，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海洋人才中心，努力培养海洋科学基础研究领军人才、海洋卓越人才工程师和文理交叉的治理复合型人才；围绕推动全球海洋共同价值高水平对外传播、深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中国海洋科技融入全球海洋治理实践活动等，实施超学科系统综合培养，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具备扎实“大海洋”知识背景的全球化海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来华留学、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实现在地国际化发展，培育跨文化海洋素质拔尖人才；通过与全球校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让全球校友直接或间接活跃在我国参与国际海洋议程、实施国际海洋合作的第一线。

构筑引领性全球海洋科技高地

全球海洋事业需要以创新引领驱动发展，海洋科技前沿深刻塑造了人类海洋活动的前途面貌，也成为全球海洋竞争的主战场。在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海洋科教力量最显著的优势是海洋科技先导性驱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解决所有创新难题，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需整合全球海洋创新资源，开展联合攻关。海洋科教力量特别是涉海高校本身就是综合性涉海学科研究的主阵地，是推动高水平海洋科技创新合作的先行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下，必须把海洋科技创新立于全球海洋实践的基点上，聚焦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资源可持续利用、深海探索等全球海洋科技前沿，注重交叉研究和立体综合观测，集聚全球优势力量联合推动大型国际科学计划、共建共享大型科研平台。通过海洋科技合作与帮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和投入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中强调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海洋科教力量更需进一步加强有组织科研，把实现海洋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提高海洋科技话语权与集成解决全球海洋领域复杂问题的重要立足点。充分发挥海洋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强化自身基础科研能力，打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化技术研究”三位一体全链条布局，推动科技成果实现高效转化应用，建设全球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锻造海洋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别是“国之重器”；自觉以全球海洋之问为学术已任，形成支撑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坚实理论基石，构建中国海洋自主知识体系。

打造全球海洋科教合作网络

海洋的流动性、关联性及多变性使各国命运紧密相连，解决好全球性海洋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文明交融、共赢发展。在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海洋科教力量最鲜明的特点是以坚定文化自信融入国际交流合作。我们要深入推动海洋文化交流互鉴，广泛宣传中国主张与方案，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为全球海洋科教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动实践者，海洋科教力量要努力克服全球海洋治理“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以交往合作为先导，通过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实现海洋知识要素与海洋文化成果在全球海洋科教机构中的生产、共享和转换，形成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传承和创新海洋文化的多维合作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海洋科教力量要积极推动构建高能级全球海洋科教协作创新网络，在促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海洋科教机构的交流与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着重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在实施重大战略、共享重大设施、牵头重大计划中推动国际合作。联合全球主要涉海科教机构及国际学术组织，加强全球海洋科学数据与学术资源的开放交流，加强海洋教育和培训，培养新一代的海洋治理人才和杰出科学家。实施“海上丝路”教育行动，大力拓展与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为其培养海洋、水产、环境等领域知华友华人才，提高公众对海洋重要性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认识。打造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蓝色高端智库，促进海洋产业新升级，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包容性增长，支持制定并实施科学的政策，促进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海洋治理，在全球海洋科教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是一座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建设的国家级科学家博物馆，建设这座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钱学森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于2011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建成开馆并对外开放，2024年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以钱学森文物为主的藏品约6.2万件/套，已鉴定珍贵文物10620件/套。这些藏品既是钱学森科学报国实践的物质见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

银行活期存折——为国求学的见证

1989年钱学森获得由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小罗克韦尔奖章”时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钱学森的一本银行活期存折就从文物角度提供了“根据”，同时亦见证其为国求学的初心使命。1949年暑期钱学森由麻省理工学院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7月18日到洛杉矶安全——国民银行的奥克诺尔支行办理一本活期存折并存入660.56美元。钱学森执教加州理工学院的年薪是10000美元，但归国前一天即1955年9月16日取出的银行存款仅有1007.64美元。钱学森年薪要比同期美国大学教授高，但除自己家庭生活支出和寄给父亲生活费之外，为及时掌握科技前沿信息而购买新出版图书报刊的费用也是一笔不菲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特地选择办理银行的活期存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当1949年钱学森答应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之际，就收到一封来自“北方局”的信件。这封信件是1949年5月14日由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遵照“北方工业主管人”之意，请钱学森回国后“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当钱学森收到信件后就作出回国决定，而其时因已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聘任，故而选择办理活期存折以便能够随时回国。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被迫滞留美国长达五年之久，但这期间他一刻也不曾放弃任何归国时机并以写给陈叔通的“求援信”为契机于1955年回到祖国，由此实践青年时期业已建立的为国求学这一素志。

教学大纲手稿——为国育才的见证

钱学森归国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为新中国尖端科技事业作出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限量之贡献，同时他在为培养青年人才方面作出的贡献亦值得书写。以钱学森的一份教学大纲手稿为例可见其为国育才、为国造才的战略布局。此教学大纲为钱学森担任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开设“计算技术”课时草拟，由大纲可知课程在四年级下学期和五年级上学期讲授。钱学森为何要在近代力学系开设此门课程呢？因为钱学森滞留美国之际就意识到计算技术将会对科技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故而研究工程控制论时专门研究过计算技术。钱学森希冀将自身研究计算技术的成果转化为课程的教学内容，“让力学研究工作者能具有使用快速电子计算机（数值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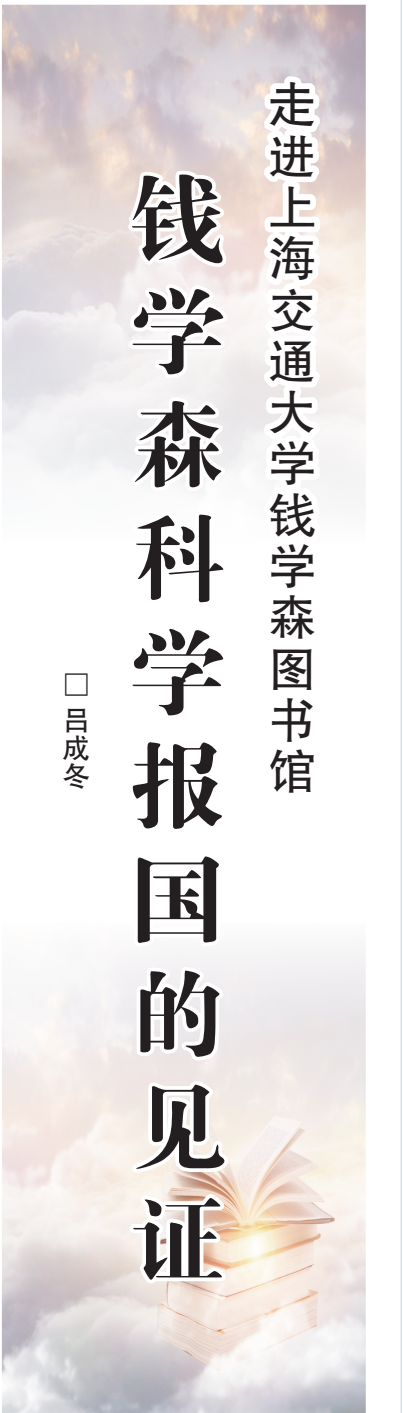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就是力学研究者要掌握运用计算数学的方法和懂得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并进行“程序设计”，由此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提高科研效率。由今观之，计算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力学研究并横贯力学的各个分支，同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新兴学科——计算力学。这份手稿体现了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对科技前沿的整体把握能力。同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钱学森为讲好“火箭技术概论”“空气动力学”“物理力学”等课程而亲自设计课程内容和编写教材，出发点就是希望将力学领域最新成就传授给学生，以期在中国本土培养出能够站在世界科技成就高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杰出人才。

中央党校聘书——为国立言的见证

1991年12月20日，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向钱学森颁发兼职教授聘书。这份聘书是晚年钱学森引以为傲的学术身份，因其见证了钱学森和中央党校的情缘，尤其是1977年至1989年钱学森到中央党校开展讲学。兼职教授虽是荣誉性质，但他以“全职”态度投入。晚年钱学森的治学兴趣转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中央党校为其提供了重要舞台。钱学森很多讲学内容曾以铅印单行本发行或发表在《中央党校校刊》《理论月刊》等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其中还有三篇收入1985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编写的教材《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我国科技政策讲座（试用本）》。及至1988年钱学森还致函编写者吴义生询问学员对教材有无意见，并提出要“尽量修补”。

钱学森在中央党校讲学的实践，既体现出“社会主义中国要吸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以创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文化”，又对当时思想界普遍存在的“拿来主义”作深刻批评与积极吸收。钱学森在中央党校讲学的实践回答了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为谁治学”的问题，而这份聘书背后的故事说明钱学森始终将为国治学作为立身之本。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坚持政治建馆、学术立馆、人才强馆、传播兴馆。同时以三大发展目标为重要牵引：一是成为研究、阐述和传播钱学



森精神的重镇，其二是成为面向社会“活化”钱学森文物的枢纽，其三是成为博物馆“大思政课”创新实践的典范。为此，在学术方面，以钱学森研究和博物馆研究为两大支柱，进而以学术成果支撑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在展览方面，以基本陈列“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为主题而衍生出“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信仰”“遥望比邻——Dreams to Reality”“积健为雄——钱学森教学手稿展”等专题展览。在社会教育方面，着力打造“钱学森精神宣讲团”“钱学森精神进校园”“星空少年讲解团”“青春告白祖国”“星际航行学院”等品牌。由此，在不断推动展教研一体化和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过程中为社会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文化服务，进而通过“让文物活起来”的实践不断挖掘钱学森精神的丰富价值。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馆长）



中华文明以独特的伦理智慧构建了绵延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其中“君子文化”作为核心精神标识，既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密码，也是当代文明对话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君子文化始终在与时俱进中焕发着生机。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君子文化进行重构，形成了多元阐释体系。孔子将“君子”从贵族身份符号转化为道德人格概念，完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明革命。在《论语》构建的价值体系中，“君子”具备三重文明属性，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觉，以“礼”为载体的文化认同，以及以“智”为特质的实践理性。

与此同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派也对君子文化提出了各自的见解。道家秉持“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自然之道，倡导顺应自然；法家主张“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实用理性，注重实际功效；墨家崇尚高士“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的兼爱精神，追求无差别的大爱。诸子百家思想的碰撞，客观上丰富了君子文化的内涵，增强了君子文化的包容性。

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揭示了君子文化的深层基因。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礼器群，印证了夏商时期“器以藏礼”的文化传统；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德”字的演变，勾勒出道德觀念的制度化進程；清華簡《保訓》記載的文王遺訓，將“中道”思想追溯至上古帝王。這些物質遺存表明，君子文化並非凭空而生，而是植根於中華文明早期的禮樂傳統，經過時代的思想淬煉，最終形成完整的價值體系。

秦漢以降，君子文化歷經三次重要轉型，在不同歷史時期實現了範式轉換，保持着思想的活力與發展态势。漢代經學將君子文化納入天人感應體系，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的倫理主張，將君子之道提升到治國方略的高度，使君子文化與國家治理相連。魏晉玄學賦予君子文化形

而上學維度，王弼“聖人體無”的哲學詮釋，為人們開拓出精神超越的新境界，讓君子文化在哲學層面得到發展。宋明理學完成了君子文化的心性論升華，為士大夫提供了具體的實踐路徑，使君子文化在個人修養方面更加深入和細化。

歷史長河中的諸多典型案例，生動地詮釋了君子文化的實踐智慧。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政治擔當，傳承了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的入世精神；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突破，發展出注重實踐的新型君子觀；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吶喊，將個人修養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這些不同時代的典範人物，從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共同丰富了君子

文化的时代内涵，使君子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在现代社会，君子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功利主义对价值理性造成侵蚀，文化全球化冲击着传统认同。然而，这些挑战也凸显出君子文化特殊的现代价值。管理学中的“复盘”思维、心理学中的元认知理论，与“反求诸己”的修养功夫相互呼应。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每日三省”的实践，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论述，都印证着这种古老智慧的现代生命力。

面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君子文化的弹性智慧展现出独特优势。在职业领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进退哲学，为当代人平衡事业追求与

生命意义提供启示；在公共生活中，“和而不同”的交往智慧，为构建理性对话空间贡献方案；在全球治理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为化解文明冲突贡献中国智慧。

传统君子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需在三个维度取得突破：从传统伦理向公民道德转化，将“仁爱”“诚信”等价值融入公民教育，推动君子文化大众化；从德性伦理向责任伦理拓展，强化“义利之辨”中的责任意识，回应现代社会分工需求；从心性修养向制度建构延伸，借鉴传统“礼法合治”经验，将道德理念转化为制度设计。从心性修养到制度建构，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和谐”“公正”的强调，可视为君子文化的现代

重构。这种转化既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面向未来的创新。

数字文明时代的新挑战，更需要君子文化的智慧启迪。面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推己及人”的恕道精神可为算法设计注入人文关怀；在应对信息碎片化危机时，“博学审问”的治学传统能提升现代人的信息素养；元宇宙中的身份认同困惑，则可从“君子不器”的人格理想中获得启示。这些创造性转化，使古老智慧成为破解现代性难题的文化资源。

站在文明对话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君子文化的演进脉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遗产的传承，更是文明基因的创新。从蓬伯玉到王阳明，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君子文化始终保持着“旧邦新命”的文化自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深入挖掘其现代价值，不仅关乎文化自信的根基筑牢，更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路径。



漫谈君子文化

□ 李 乔